

章元——著

中国农村经济

制度、发展与分配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作品

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 主编 陆铭 陈钊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章元——著

中国农村经济

制度、发展与分配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作品
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分配/章元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陆铭,陈钊主编)

ISBN 978-7-5432-2074-4

I. ①中… II. ①章… III. ①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 IV. ①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8473 号

责任编辑 李 娜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分配

章元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插 页 4
字 数 232,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074-4/F·521
定 价 38.00 元

总序：问题导向的经济学

在过去的七八年里，中国经济学界涌现出一批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关注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和制度环境，既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上，也没有生搬硬套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他们是中国经济学的希望所在。作为这批青年经济学家的代表，陆铭和陈钊两位发起主编《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并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中国经济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从“发展组”走出来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们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让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半正式的研究小组。之后，他们进入体制内部的研究机构，从而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做针对性的研究工作。他们深入基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那时虽然没有理论，但却常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正因为如此，那时的经济学研究和政府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一些政策建议（如价格“双轨”制）直接成为政府政策。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经济学最令人兴奋的时期。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开始向学院化转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学科要有积累和发展，就必须创立一套研究语言，现代经济学理论就是经济学的研究语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令人敬畏之处在

于：在一个关于人的行为的简单假设——即理性假设——之下，它构建了一套模拟理想市场运作的优美且内容丰富的逻辑体系，而且，它的多数预测都被经验研究所证实。这当然不是说现代经济学穷尽了对现实世界的描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作用不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详备的描述，而是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提供一个简化的模型，让我们在纷繁的现实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反映的是现实世界的局部常态，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片面才能深入，追求大而全反倒会流于肤浅。中国经济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过的路，是引进和消化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主要高校纷纷开设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对学生的训练越来越规范；在研究方面，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和计量方法。

进入新世纪之后，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高校中已经形成了近十个归国学者集中的机构。归国学者的加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规范化，并把经济学论文发表的门槛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教育部到各主要经济学院系，对教师的考核纷纷提高了标准，教师要获得学术晋级，国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基本要求，国外发表论文的权重大大增加。虽然一些院系的做法过于苛刻，但总体而言，考核标准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然而，任何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中国经济学在规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其中之一是囫囵吞枣，即生搬硬套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这在一些年轻学者特别是博士生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是没有融会贯通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要加强现代经济学的教育。但是，这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更多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建模技巧，记住更多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帮助他们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我接触过很多中国留美博士生，考试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做论文才是最困难的。由于不容易获得中国的数据，而且美国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也不欣赏中国研究，绝大多数留学生不得不研究美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对美国的了解有限，一些对于美国学生来说信手拈来的常识，对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留学生只好选择做数理经济学或者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国内学生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即无法建立起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有些学生更是错误地认为理论模型可以用来证明

一个原理或规律。中国经济学要有更大的发展,非得让学生回归现实不可。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是,因为强调国外发表论文,一些学者特别是部分归国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国外学术界感兴趣,但却不一定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比如,一些学者以研究文献为起点,希望找到文献中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而不是到现实中去寻找问题。正如林毅夫教授常说的,他们是坐在中国这座金矿上寻找煤炭。归国学者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那为什么要回国呢?

与此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相脱节。在经济学家当中,正逐渐形成学院经济学家和政策经济学家的分野,两部分人都相互瞧不起。一个社会里存在政策经济学家是正常的事情,政府和企业对他们的需求非常大;但是,学院经济学家不关心政策讨论却是不正常的。一些人可能会说,你看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不关注政策。这是误解。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如罗伯特·卢卡斯)只关注学术而有意回避政策讨论之外,美国的知名经济学家都积极地介入政策讨论,那些表面上没有介入的,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而已。正是因为没有机会,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只是把经济学研究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经世济民的手段,因而他们的研究往往与现实脱节,成为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型阶段,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不介入现实,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愈发意识到本套丛书的作者以及他们倡导的研究风格的可贵之处。他们当中既有本土培养的学者,也有归国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迷信文献,而是从现实中寻找问题,并上升到理论。丛书的名称定为“制度、结构与发展”,意在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放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增长奇迹并不成其为一个奇迹,因为中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没有超出标准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如高储蓄、高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管制、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民营化、保护产权等等。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却没有采纳?进一步,为什么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了超常的经济增长,而多数转型国家却陷入过长时期的倒退?

国内外的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成功源于中国的威权体制,但是,这个解释如果不是源于学术上的懒惰的话,也是有意而为之的曲解之论,无法经受现实的

检验：如果威权体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那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应该成功了，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有人可能会说，威权体制+计划经济不成功，但威权体制+市场经济就可以成功。这个辩解本身就已经承认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对比改革开放前后30年，政治体制没有变，而经济制度改变了，因此，我们唯一的结论只能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威权体制。

事实上，用威权与民主的两分法来概括中国的现行体制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它不仅遮蔽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丰富性，而且助长了学术上的懒惰之风：用威权或民主来套中国的制度和体制，然后开始推演，看似逻辑严密、道理精辟，实则是对他人理论的空洞无物的重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没有民族自信的表现。从任何方面来看，中国都正走在民主化的大道上。学者的任务是分析我们所走过的路，并指明未来道路的各种可能性。这要求学者对我国的体制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分析，看哪些内容是起到正面作用的，哪些内容是应该摒弃或改变的。中国既然能够产生经济奇迹，中国的体制当中一定存在合理的成分，中国学者应该不怯于把它们展示给世界。

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中国所走过的路没有特殊性，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是世界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部分。这不是说中国所走过的路和其他国家一模一样。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但是，如果仅仅为此就认为中国是独特的，那所有国家都是独特的，宣示一个国家的独特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中国学者的任务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中找到具有世界意义的规律，并把它们展示给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学者就要使用世界能够听懂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是要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当下的制度和体制问题。

本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都是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且对中国现实问题具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学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的影子。但是，他们的工作不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简单重复，套用过去常用的说法，是发生了“螺旋式的”上升；他们不再轻视理论，而是要从中国的现实中发掘理论。长江后浪推前浪，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篇章。

鸣 谢

本专著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 重大项目“中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变：贫困脆弱性的视角”(08JJD79015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37)和“新型城市化视角下的经济发展的转变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03)的资助。同时感谢“复旦大学 985 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科项目”的支持。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农村经济发展	001
第一节	“中国奇迹”下的农村经济发展	001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整体框架	003
第二章	工业化、市场化与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反贫困之战	006
第一节	中国减少农村贫困的成就	006
第二节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分析	009
第三节	市场化与工业化的渗透效应	018
第四节	中国减少农村贫困的经验	037
第三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户长期投资激励	050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及其意义	050
第二节	土地调整与农户长期投资激励	053
第三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067
第四章	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077
第一节	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077

第二节	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青少年义务教育	080
第三节	中国目前要不要放松人口数量控制	094
第五章	村民选举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与供给	102
第一节	村民参加选举的经济激励	103
第二节	村民选举对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112
第六章	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	119
第一节	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20
第二节	异质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工资水平	134
第三节	社会关系网络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意义	152
第七章	户籍制度、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融合	163
第一节	户籍制度的建立及其功能	163
第二节	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工进城与犯罪率上升	165
第三节	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	188
第八章	农村经济发展:中国的经验	202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事实	203
第二节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国经验	209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31

第一章

导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农村经济发展

第一节 “中国奇迹”下的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381 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25 575 元,也就是说,中国的 GDP 连续 30 多年基本上保持年均 8% 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43.4 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17 174.7 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33.6 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5 153.2 元。另外还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从 1978 年到 2009 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由 598 所增加到 2 305 所,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从 20.6 万人增加到 129.5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由 40.2 万人增加到 639.5 万人;全国的医院数量由 9 293 个增加到 20 291 个,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由 2.57 个增加到 4.15 个;全国新生婴儿死亡率从 1991 年的 33.1‰ 下降到 2009 年的 9.0‰,孕产妇死亡率从 1991 年的 0.8‰ 下降到 2009 年的 0.319‰^①。所有这些数据都指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众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 30 多年,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深化的 30 多年,而在此过程中,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要形式的城市倾

^① 如非特殊说明,本专著中所引用的数据都来自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向政策为中国经济腾飞所需的快速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有大量事实、证据和研究等都一致地表明：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大都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和农业部门的壮大。例如，从宏观统计数据看，中国的第一产业（或农业）的增长远不如整体经济增长那么好，从 1978 年到 2009 年，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98%，而第一产业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4.47%^①；在 GDP 的构成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也由 1978 年的 28.2% 下降到 2009 年的 10.3%。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业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从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早期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因此而采取的城市倾向政策对农业的增长很不利，并进而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不利，有大量研究批评中国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城市倾向政策不利于农业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等，1994；Carter，1997；Yang，1999），更有大量研究批评由于城市倾向政策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Yang and Zhou，1999；Yang，1999；张晓波，2003；Kanbur and Zhang，2004）。例如，林毅夫等（1994）认为，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步履维艰，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由于违背了资源比较优势原则，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的结构遭到了严重的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他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战略导致了两方面的效率损失：第一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它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偏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二是技术的低效率，它使得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和工人的工作激励降低，从而导致了生产技术的低效率。

尽管如此，我们却依然能够在“中国奇迹”中看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 1978 年到 2009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了 7.6 倍，家庭人均不变价格消费水平从 138 元增加到 4 021 元，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 1978 年的 67.6% 下降到 2009 年的 41.0%；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 1978 年的 30.7% 迅速降低到 2007 年的 1.6%^②；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从 1991 年的 58‰ 下降到 2009 年的 17‰，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从 1991 年的 1‰ 降低到 2009 年的 0.34‰；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

① 根据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平均增长率的简单平均计算而来。

② 从 2008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采用高于国定贫困线的低收入线来度量低收入人口数量，不再公布采用国定贫困线度量的贫困人口数量。

机的数量从 1990 年的 4.7 台迅速上升到 2009 年的 108.9 台。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农业人口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福利的增长速度相对慢一些,但是其速度也依然是惊人的。所以,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系列需要我们给予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尽管中国农村经济的增长不如总体经济增长表现得那么良好,但是中国农村经济在过去 30 多年中的增长依然如此巨大,其背后的主要动力是什么?虽然中国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利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但是中国农村经济为什么依然在快速增长?虽然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都认为一个发达的农业对于整体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但是为什么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相对落后依然能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30 多年?

显然,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绝对不是仅仅几种力量或政策所单独推动的,它必定是众多制度和政策及其他因素“合力”的结果。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快速发展背后的制度与政策基础,就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目的。特别地,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视角总结来自中国这样一个从落后起点上腾飞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是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方面。要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的一般规律或经验,则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而这并非本书的目标。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整体框架

中国农村经济在过去 30 多年里的快速增长以及增长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必然受到很多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的影响,而这些政策与制度对各种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的经济机制则是本专著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农村经济在过去 30 多年里的快速增长与“中国奇迹”一样无疑也是成功的,总结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和调整还是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

意义，而这正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意图之一。

围绕上述研究动机，本专著在一个有机的逻辑框架下系统地分析了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多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计划生育政策、财政金融扶贫政策、村民选举制度、户籍制度等，以及以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这些社会经济制度和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流动、耕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农业生产资本投资、农村公共品供给等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书将基于大量的农户面板数据和宏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这些政策和制度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和渠道，从而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经验奠定坚实的基础。本书的内容是按照如图 1.1 所示的逻辑框架来组织和展开分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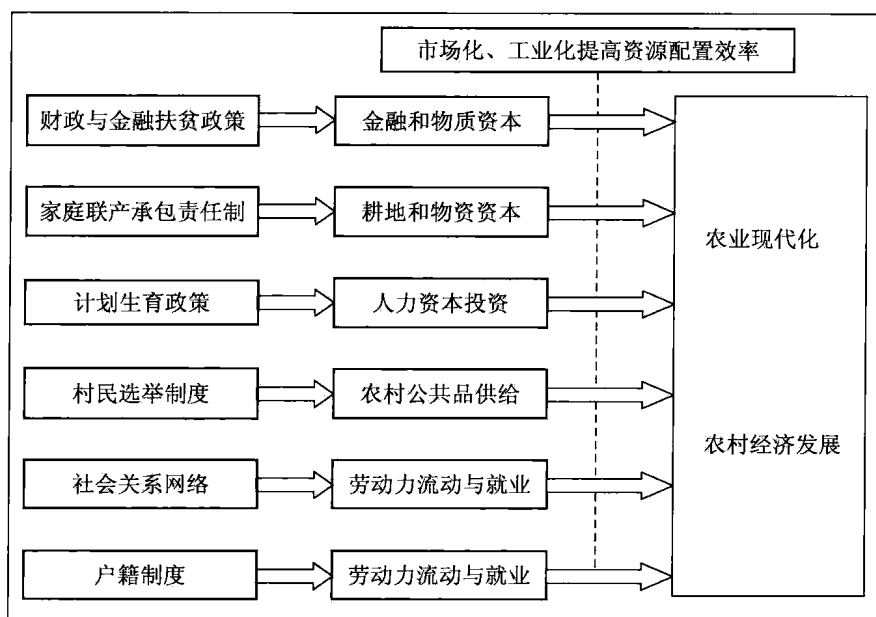


图 1.1 本书逻辑框架

本书的第一章为导论；中国的财政与金融扶贫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的金融和物质资本的影响主要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中加以介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耕地资源的配置以及对农户的物资资本投资的影响在第三章中进行分析；

第四章重点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村民选举制度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是第五章的研究内容；第六章分析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第七章主要分析户籍制度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另外，在第二章的第三节中我们还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市场化和工业化对于农户产生的渗透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揭示出市场化和工业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提高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机制；第二章的第四节则总结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成功经验，与之相对应，第八章基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事实，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本书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政策对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并同时分析市场化和工业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渗透效应，然后基于这些研究总结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一般经验和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过去 30 多年里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和展望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地，本书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基于中国的农户调查数据以及官方统计数据而展开的，从而为本书所分析的各种理论机制以及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提供坚实而科学的基础。

第二章

工业化、市场化与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反贫困之战

第一节 中国减少农村贫困的成就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很多理由吸引全世界的政治家和研究者的目光:连续 30 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对于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农村贫困人口曾占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人口的一半,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非常迅速从而对世界贫困的减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些重大问题无疑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上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这些相关的重大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根据官方公布的农村贫困人口数据,1978 年的农村贫困人口为 2.5 亿,而到了 2007 年则只剩下不足 1 500 万。在此期间内,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下降的趋势并不十分稳定。例如,根据表 2.1 的数据可以看出,贫困人口的快速下降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上半期,贫困发生率从 1978 年的 30.7%降低到 1985 年的 14.8%;此后,农村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则开始变慢,2003 年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甚至出现了反弹。

表 2.1 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1978—2007 年)

年份	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万)	贫困发生率(%)
1978	25 000	30.7
1985	12 500	14.8
1990	8 500	9.4
1991	9 400	10.4
1992	8 000	8.8
1993	7 500	8.2
1994	7 000	7.7
1995	6 540	7.1
1996	5 000	6.3
1997	4 962	5.4
1998	4 210	4.6
1999	3 412	3.7
2000	3 209	3.4
2001	2 927	3.2
2002	2 820	3.0
2003	2 900	3.1
2004	2 610	2.8
2005	2 365	2.5
2006	2 148	2.3
2007	1 479	1.6

资料来源:1993 年和 1996 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 2001 年度报告,其他年份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 2005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然而,有众多学者批评指出,中国度量贫困发生率数据的贫困线过低,所以表 2.1 中的贫困发生率大大低估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规模。例如,1998 年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每年人均收入 635 元,即平均每天 1.74 元,而按照官方汇率代表的购买力平价,1.74 元只能折合 0.22 美元,即使使用 Penn 世界表估计的购买力平价,1.74 元也只相当于 0.44 美元。这与世界银行制定的每天 1 美元的国际低标准贫困线相差甚远(CSLs, 200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农村的实际贫困发生率比官方公布的贫困发生率要高许多。

表 2.2 显示的世界银行对中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的两个估计表明:按照国际标准估计的贫困发生率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率高许多,2001 年分别基于收入和支出指标估计的贫困发生率相当于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发生率的 3 倍左右。